



# 向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刘洁\*

**摘要** 向达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首任馆长。任馆长期间,向达明确大学图书馆的性质是促进教学科研的学术性机构,直接对学校负责;推动北大图书馆的馆址迁移及其与燕大图书馆的深度融合;克服房屋和人员的不足,配合全校教学改善读者服务;从经费保障、馆藏建设、科研环境等方面建设研究型的北大图书馆。向达将自己长期治学积累的学术眼光运用于办馆实践之中,为北大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向达 北京大学图书馆 院系调整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4.01.015

向达是以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研究著称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首任馆长。<sup>①</sup>他早年先后任职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北平图书馆,1935年被北平图书馆以交换馆员的身份派往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整理中文图书目录,具有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验。中年以后,向达的史学研究成果渐为学界瞩目,1939年起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195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以说,图书馆事业与史学事业交互贯穿着向达的一生。早期的图书馆工作经历成就了向达的史学研究,在生命的中后期,向达又将自己的学术积淀运用于图书馆管理工作中,可谓从图书馆来,到图书馆去。

关于向达的史学贡献<sup>[1-2]</sup>、向达的图书馆经历与其史学成就之间的关系<sup>[3-4]</sup>,学界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至于向达的图书馆思想及实践,学界还止于浅尝<sup>[5]</sup>,尤其对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经历的研究十分不足。有鉴于此,本文集中探讨向达任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馆长期间的相关

史实,揭示馆长与历史学者这双重身份之于向达的张力,以期丰富北大图书馆馆史及向达生平之研究。

## 1 就任新中国成立后北大图书馆首任馆长,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

1949年1月,北平正处于和平解放的前夜。1月17日,北大秘书处致函时为历史系教授的向达:“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现在请假南下,所遗职务敬请先生代理”<sup>[6]</sup>。1月21日,校秘书处将任命送达图书馆,向达开始担任北大图书馆代理馆长<sup>[6]</sup>。结合向达此前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历,他确为这一职务的合适人选。1949年5月4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任命向达为北大图书馆馆长<sup>[7](485)</sup>。时值建政初期,百废待兴,北大图书馆亦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向达上任后即面临着几个关系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 1.1 明确图书馆在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中的地位和性质

1950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大学图书馆馆长对大学教务长负责。按照这一规定,图书馆的地位与严文郁所抱怨的西南联大图书馆无异<sup>②</sup>,即“在大学里面在教务方面没有地位,办

\* 刘洁,邮箱:dd-liujie@cass.org.cn。

① 向达(1900—1966),字觉明,湖南溆浦人,1949年至1957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② 1938年底,西南联合大学对该校图书馆进行改组,使其从隶属于学校变为隶属于教务处。西南联大图书馆主任严文郁认为此举使图书馆地位降低,工作难以展开(见邹新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文郁写给胡适的两封信——史料、纪念与感想[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2):109)。



理图书工作更感棘手”<sup>[8]</sup>。为此,向达向校方力争,成功使学校承认图书馆与教务处、总务处平级,由分管副校长直接领导<sup>[7](558)</sup>,保证了图书馆在学校的地位。

此外,向达也努力明确图书馆的学术性质。院系调整后,北大校务委员会对图书馆的指示“只有配合教学几个字”,向达认为这“抽象又不够明确”,因而向学校提出:“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应予以明确规定”<sup>[9]</sup>,即大学图书馆仅需配合教学,还是同时也应配合科学研究?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sup>[10]</sup>,这对高校图书馆而言是一个重要机遇。是年5月11日,向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郑重呼吁:“大学图书馆也必须担负起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任务”<sup>[11]</sup>。12月,为响应“向现代科学进军”,高等教育部举办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会前,高等教育部于7月和11月先后两次召集包括北大图书馆在内的高校图书馆负责人进行座谈并征集意见,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确定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性质<sup>[12]</sup>。最终,这些座谈意见基本被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吸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馆长受校长或科学研究副校长直接领导”<sup>[13]</sup>。至此,高校图书馆在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中的学术性质基本明确。

### 1.2 明确院系调整期间图书调入与划出的基本原则

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侧重于基础学科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随之而来的是各校图书的调入与划出,若无总体性方针原则加以指导,这项工作很容易陷入混乱。当时,一些高校以某个专业被划到该校为由,要求北大图书馆将所藏的该专业的书籍一并划出。面对这一情况,向达向学校建议,图书分配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1)北大图书馆是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可涵盖各方面的收藏,原则上不宜分,善本书尤其不宜分;(2)北大图书馆可将复本书尽量分给其他单位;(3)建议校方对图书分配采取慎重态度,多和图书馆沟通联系<sup>[14]</sup>。以上建议均获得学校采纳。

原则既经明确,分配图书的行动很快进行:随着一些院系被划出,20万册图书也被调出,与此同时,调入中法大学、中德学会等处图书约25万册,以及

燕京大学藏书50余万册<sup>[15](119)</sup>,加上北大图书馆的原有藏书,院系调整后北大图书馆藏书总量达160万册左右<sup>[15](125)</sup>。值得一提的是,燕京大学巨额藏书的加入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北大图书馆馆藏,也使其工作方法愈发科学。例如,院系调整后,编目方法融合北大和燕大二馆各自优长,中日文图书分编沿用原北大图书馆所用皮高品《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西文图书分编使用燕大图书馆采用的《杜威十进分类法》,俄文图书分编仍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同时参考苏联《十进分类法简表》<sup>[15](126)</sup>。

### 1.3 分批次有重点地进行馆址迁移

院系调整后,北大图书馆于1952年9月匆忙从沙滩旧址迁到燕园新址。受时间紧迫、人手不足及燕园房屋紧缺等的制约,大部分藏书一时未能迁走,滞留在沙滩旧址。这样,北大图书馆在1952年至1954年期间就分为城内馆(即位于沙滩旧址的老北大图书馆)和城外馆(即燕园馆)两部分。由于当时城内北大建筑群被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学院等几所学校共用,城内馆也就同时对这几所学校开放。向达对这种情形颇为忧心——学校主体已迁到城外,藏书却孤悬于城内,管理起来十分不便。1952年下半年,他对学校提出:“沙滩北大图书馆和政法、财经、地质三单位的关系如何,亟应确定下来。不然的话,图书馆一方面穷于应付,一方面管理和安全问题,我们也感到甚为严重”<sup>[14]</sup>,促使校方意识到书刊搬迁的紧迫性。很快,搬迁工作启动。

书刊搬迁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图书馆采取了分批次、有重点的办法。首先被迁走的是已编目的中外文书刊。1953年9月,北大图书馆将城内馆已编中文书11.8万余册运到燕园;1954年3月至4月,将城内馆已编外文书刊8.7万余册运到燕园,两次迁来的书刊均存放在俄文楼楼顶。1954年5月,北大将城内图书馆大楼移交给中宣部,仅保留了其中二、三、四层作为书库及办公室5间,城内馆从此不再开放。其次,善本书极其珍贵,无论已编未编均优先迁走。1954年9月至12月,北大图书馆将城内馆已编善本书800余种、西文善本20余种、日文善本200余册及李盛铎藏善本书9000余种、马廉藏善本书900余种迁到燕园,存放在民主楼。1955年初,图书馆继续将城内的未编善本书迁到民主楼<sup>[9]</sup>。至此,善本书基本搬迁完毕。除搬迁书刊外,图书馆还于1954年4月将城内馆的1000多件家具



搬到燕园,存放在总面积达 400 多平方米的两个临时仓库里,包括办公桌、椅子、衣架、桌灯、挂灯、地毯、保险柜、茶壶等等<sup>[16]</sup>。

经过上述几次大型搬迁,城内馆的精华藏书和物资已搬到燕园,但仍剩下过半书刊滞留城内,本想待燕园新馆建成后就搬,但由于 1955 年度全校分到的基建面积缩减,修建新馆的计划暂停,向达只好指示馆内各股股长:“城内图书暂缓出城”<sup>[17]</sup>。后来新馆迟迟未建,城内书刊搬迁遂搁置下来。尽管如此,城内图书馆的主体收藏均已迁到燕园并得到妥善保存,馆址迁移工作告一段落。

## 2 克服困难,配合全校教学改善读者服务

20 世纪 50 年代,战乱停止,国家趋于安定,急需大量人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北大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学生总数亦迅速增长,1951 年全校学生共 3571 人<sup>[7](528)</sup>,1956 年增至 8011 人,若加上教职员,此时全校师生人数在 1 万人以上<sup>[7](608)</sup>。师生人数的急剧增加远超出学校的资源容量,导致房屋和人力过载。身为图书馆馆长的向达,努力克服困难,提升读者服务水平,为全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2.1 克服房屋不足,改善书库和阅览室服务水平

北大搬到燕园后,校舍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这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一是燕园的房屋面积本就比城内的老北大小。老北大建筑虽然分散,但房屋总面积达 13.2 万平方米。燕京大学则是为 800 名左右的学生规模设计的,校园虽大但房屋面积小,仅 8.5 万平方米<sup>[18](1485)</sup>。其二,50 年代师生人数的急剧扩张加剧了房屋不足的问题。1956 年底,全校师生人数已是原燕大师生总数的 10 倍,但校舍面积只增加了 1.45 倍<sup>[19]</sup>。其三,在全校房屋紧张的大前提下,各部门基建工作必然存在先后次序。当时师生宿舍严重不足,尤其是 1956 年秋季扩招后,校方必须立即安排新生住宿,故决定优先修建学生宿舍 31 斋和 32 斋。受此影响,原计划 1955 年动工的图书馆于当年搁浅后,1956 年再次搁置。学校总务处对此亦不讳言:“在教学用房方面,将大力修建实验室和图书馆,但明年能施工多少,尚无把握”<sup>[19]</sup>。由于房屋不足,存放书刊的书库和师生的自习阅览室都受到严重影响。

书库面积不够导致书刊堆积如山,不能按次序

排放,找书非常不便,影响读者借阅利用。当时燕园的书库分散于大图书馆、俄文楼、外文楼等 7 处,共有书架 21312 公尺,如果要按次序摆下燕园的全部书刊,需要 23591 公尺书架,尚差 2279 公尺<sup>[20]</sup>。这还是仅就燕园所存书刊而言,若把城内滞留书刊运来,就更加无法安置。

客观情形虽是如此,向达仍设法改善。他多次向学校提议:在新馆未建成之前,暂时修盖临时书库,等新馆落成后,临时书库可改为教室或陈列室<sup>[20]</sup>。此外,鉴于北大图书馆的情况在当时并非个例——受全国基建经费不足的制约,多所大学图书馆均缺少书库,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分存在 31 个不同地方<sup>[21]</sup>,中山大学图书馆也将书籍堆放在数个宿舍楼顶或装在箱中<sup>[22]</sup>,向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呼吁国家重视高校图书馆基本建设<sup>[23]</sup>。同时,针对书库不足的紧迫现实,向达也费尽心力,分类整理,以便于读者利用。经多次调整,图书馆按书刊类别形成了一系列专题书库,包括:(1)大图书馆,即原燕京大学图书馆,出借书库藏书和理科书籍;(2)第二阅览室,位于文史楼三楼,出借文史哲类图书;(3)第三阅览室,位于文史楼东侧的原燕大电机馆(现已拆除),出借马列经典和社科文艺类书籍<sup>[24]</sup>;(4)俄文楼楼顶书库,存放城内馆运来的已编中外文书刊,相当于已编书书库;(5)外文楼楼顶书库,集中存放 1949 年之前出版的中外文期刊;(6)善本阅览室,位于民主楼;(7)才斋,存放未编书刊<sup>[20]</sup>。这样,尽管部分书刊仍堆积在书库,但读者能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前往查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书库短缺带来的利用困难。

阅览座位的不足是图书馆房屋紧缺的另一表现。1953 年秋季,图书馆共有 3 个阅览室,即第一、第二、第三阅览室,这 3 个阅览室共有 1400 个座位,平均每 3 名学生有 1 个座位<sup>[25]</sup>。随着 1954 年、1955 年、1956 年招生人数的急剧增多,座位越来越不够用。向达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多次请求学校增加阅览室。1955 年下半年,校方终于将学生宿舍四斋、十斋(各有 192 个座位)暂时拨给图书馆作阅览室。1956 年上半年,校方批准在学生宿舍区修建拥有 650 个座位的第四阅览室,专门出借理科书籍,从此文、理科图书分别出纳。学生人数增多的同时,阅览座位也在逐年增加,故 1955 年度大致能保证每 3.5 名学生拥有 1 个座位。1956 年学校扩招后,师生人数迅速破



万,学校为解决学生住宿问题,收回四斋、十斋及第四阅览室,改作宿舍,导致阅览座位锐减 1034 个。又加之各系图书室自 1956 年起改为专供教师、研究生使用,本科生自习座位实际只剩下 1000 个左右,平均每 7.5 人才有 1 个座位<sup>[20]</sup>。因此,“抢座”成为 50 年代北大学生一件苦乐参半的要事。

对此,向达向学校直言“这是一个突出的倒退现象”<sup>[20]</sup>,同时也设法进行补救。一方面,他建议校方加强对学生的宣传解释,“将阅览座位不够这一事实向他们讲清楚”<sup>[20]</sup>,以获取学生的理解;另一方面,建议校方加强学生宿舍管理工作,培养在宿舍学习的风气<sup>[9]</sup>,获得学校同意。1956 年秋,校方开始为学生宿舍配备书桌和椅凳,“使一部分学生在室内自学”<sup>[26]</sup>,可谓无奈之举。此外,尽管向达多次向学校表示,学生一般嫌教室吵闹,不爱去教室自习<sup>[27]</sup>,学校还是开放了 38 间教室,可容 3000 多人,加上阅览室一共可容 5000 多人<sup>[26]</sup>,使全校自习座位问题在客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缓解。

## 2.2 克服人力不足,提高读者服务效率

院系调整后,北大图书馆共有职工 85 人,其中职员 71 人,工人 14 人。至 1955 年,学生人数已数倍于前,但图书馆仍只有职工 89 人(其中职员 75 人,工人 14 人),较前只增加了 4 人<sup>[15](122)</sup>。北大图书馆职员虽普遍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但年龄偏大(平均 43 岁),多人患有肺病、心血管病、神经衰弱等疾病<sup>[9]</sup>,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均不乐观,从而影响了图书馆的读者服务质量。大图书馆的日常情景是:借书柜前挤了一层又一层的人,至少要一小时才能借到书,还书又要排长队<sup>[28]</sup>。向达多次向学校反映,人手不够,需增加 32 人<sup>[20]</sup>,未得批准。这样,图书馆要改善读者服务就只能通过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效率,于是向达决定从调整机构入手。

1949 年向达掌馆之初,北大图书馆于馆长之下设秘书室、总务股、中文编目股、西文编目股、阅览室、子民图书室、医学院图书馆、农学院图书馆、工学院图书馆等 9 个机构<sup>[29]</sup>。1952 年院系调整时,学校急于当年 9 月在燕园开学,遂匆忙决定将图书馆的组织机构调整为:馆长之下,设总务股、采录股、期刊资料股、编目部(下分中文、西文、俄文三个编目股)、典藏股、阅览室,即二部七股<sup>[14]</sup>。这一组织架构因系匆忙决定,运行 2 年后,向达发现“不能应付客观的需要,应从速进行必要的调整”<sup>[9]</sup>。具体说来,缺

点是“部门过多,同一工作分到几个部门去做,这样很难领导”。例如,阅览部与典藏股“同样做图书出纳、与读者直接见面、与各系联系的工作”,应予合并,如此既节省人力,又能免去交接手续;采录股和编目部亦应合并,因为“一书由购入馆内到进入书库,所经过的登录,分类,编目,制片,以及书内外加工等手续是一整套工序,应由一个部门来完成它”<sup>[9]</sup>。这一想法酝酿一年后,1955 年,北大图书馆正式精简机构,在馆长之下设立采录编目部、典藏阅览部、参考资料部等 3 个业务部门,外加馆长办公室,机构较前大为精简,职责分工也更趋明确<sup>[30]</sup>。

精简机构后,图书馆自 1956 年起采取多种办法改善读者借阅服务,工作效率大为提高。针对许多人反映的借书等候时间太长问题,图书馆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实行先交条后取书的办法,即于借书时间内交索书条,第二天借书时间内再取书。若第二天不取书,则退库不再保留<sup>[31]</sup>,以减少读者等候取书的时间。二是采取分批借条按先后次序取书。此前,读者递交借书条后,书库的工作人员按书的种类找书,导致一些读者很早交条,却很晚取到书。鉴于此,图书馆改为按读者递交借书条的先后次序,将借书条分批次装在几个不同的纸袋里,书库根据不同的纸袋辨别次序,分批找书<sup>[32]</sup>。这样大致可以保证先交条者先取到书,读者的借阅体验得到改善。三是实行文科和理科参考书分别在第二阅览室和第四阅览室出纳<sup>[26]</sup>,达到分流的效果。

为更好地配合教学,图书馆提高了指定参考书的采购供应上限。当时新华书店发行的教材性参考书印数太少,不能满足学生需要,使得图书馆的“教材供应库”的职能更加突出。为保证多数学生有参考书可用,图书馆将主要参考书的采购上限由每种 30 本增为 60 本,次要参考书的采购上限由每种 15 本增为 30 本<sup>[31]</sup>。同时,降低各年级学生的借书额度,一至三年级借书额度为 3 册,理科四年级 5 册,文科四五年级 10 册,助教、进修教师与研究生 10 册,必要时经图书馆同意可以酌加<sup>[26]</sup>,以加快图书流通速度。此外,为配合全校的政治课教学工作,图书馆大批量购入新民主主义书籍,仅 1950 年春季一次就购入 994 册<sup>[33]</sup>,将其全部开架<sup>[9]</sup>,同时,专门编制 3 套马列经典目录,俾便师生查阅<sup>[34]</sup>。



### 3 运用学者眼光建设研究型图书馆

向达认为,大学图书馆要服务教学,但不能“仅限于作学生的自修室,只库藏教材课本”,而要“担负起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任务”<sup>[11]</sup>,即朝着研究型图书馆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北京西郊被规划为文教区之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院路数所大学集中于此,具有光荣传统和丰富馆藏的北大图书馆更不能仅仅服务于本校教学,而要在整个文教区科研事业中贡献力量,从而更加凸显了建设研究型图书馆的迫切性<sup>[25]</sup>。关于建设研究型的北大图书馆的具体路径,向达决定从经费机制、馆藏建设、改善科研环境等三个方面着手。

#### 3.1 建立稳定长效的经费机制

在经费和馆藏两大问题上,经费是前提。北平解放后至院系调整前,北大图书经费偏少且不稳定。1949年9月,校务委员会规定图书经费仅占全校经费的2.6%,每月约合小米3900斤<sup>[35]</sup>。至院系调整前的1952年上半年,图书经费有所增加,按教师和学生每人每月各6斤小米(合旧币6000元)的标准发放。当时全校仅学生就有3117人<sup>[7](534)</sup>,故每月仅支給学生的图书经费即合小米18702斤之多(教师尚未计入),较1949年增加了数倍。即便如此,若要订购国外书刊,这笔钱仍远远不够,必须从教育部专款和每名新生的图书设备费中支出。院系调整后的1953年初,北大制定新预算草案,将图书费标准改为仅学生每人每月有7000元图书费<sup>[36]</sup>,教师没有图书费。这一标准相比于此前学生和教师每人各有6000元图书费,明显减少。

对此,向达向校方直言新预算的图书经费比过去“有减无增”,并就图书馆经费问题专门给学校写了报告,提出下述困难和建议:第一,订购国外书刊是图书馆的大项支出,以前从教育部专款及新生图书设备费中支出,但这毕竟不是常态性经费,一旦不发就很难办。第二,图书馆应作为一个预算单位拥有自己的经费。报告认为,学生每人每月的7000元图书经费应完全用来购书,在此之外,学校另拨给图书馆一笔经费,以供书刊的保养维护装订及馆内购买卡片等日常开销,金额应为购书费的1/3<sup>[36]</sup>。学校须明确规定这笔经费的性质是行政开支还是图书开支,如作为图书开支,图书费就必须增加,如作为行政费,则应在总务处供应科单独列支。第三,经费结算方式应由一月一结改为一季度一结。邮局代订

国内期刊报纸是三月一结,如果学校对图书馆实行一月一结,图书馆就无法一次性凑够给邮局的报刊费。此外,一月一结使得“上月的钱不能带到下月”<sup>[36]</sup>,经费使用起来极为不便。

经过努力争取,这些意见基本被校方采纳。首先,学校从1953年起逐年提高了图书经费,1953年为12万元(新币,下同),1954年为16万元,1955年为17万元<sup>[15](124)</sup>。相比于同期其他的大学图书馆,如复旦大学图书馆,1953年购书费为3万多元,1954年为9.9万元,1955年为13.9万元<sup>[37]</sup>,北大的图书经费相对充裕。经费增加后,国外书刊订购费就包含在图书经费之内,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部拨专款,从此有了稳定来源。其次,学校同意图书馆拥有一笔自主支配的经费,也包含在上述图书经费之内。根据图书馆1955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图书经费分为经常费(占1/4)和国外订购费(占3/4)两部分,在经常费项下,一半(即全部图书经费的1/8)由图书馆自主支配<sup>[30]</sup>。该年度图书经费为17万元,则图书馆自主支配的经费为2万余元。有了这笔经费后,每当各院系购书要求超出原本预算额度时,图书馆就能从自己的经费中省出一部分加以填补,从而保证馆藏建设的稳定长效。最后,对于向达提出的图书经费按季度结算的意见,学校也同意了,后来实际上是按年结算,大大增加了经费使用的灵活性<sup>[30]</sup>。总之,经过向达努力争取,北大图书馆有了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为馆藏建设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

#### 3.2 打造长远发展的馆藏体系

在稳定充足的经费支撑下,向达领导北大图书馆开展有序的馆藏建设。向达认为,加强研究型图书馆的馆藏建设,首先要注意系统性,即“有计划地、有系统地搜购有关科学研究的重要图书”<sup>[11]</sup>。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经费分配使用制度,使书刊订购尽量涵盖各个学科,不致偏废。

1954年之前,北大图书经费按比例分给各系,图书馆几乎没有统筹余地。各系分到图书经费后,往往重复订购同一种书,例如某教研室买了100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sup>[38]</sup>,与此同时,一些该买的书却没有买,以致馆藏“乍看似乎都有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稍为深入一点,就感觉到非常不够”<sup>[39]</sup>,既影响书刊采访的全面科学,也造成图书经费的浪费。有鉴于此,学校决定自1954年开始由图



书馆统一掌管全校图书经费<sup>[40]</sup>。

名义上是如此,实际上图书馆并未真正做到统管全校图书经费,而是仅掌握订购权,选书仍由各系来定。如前所述,50年代中前期,图书经费分为经常费(占1/4)和国外订购费两部分(占3/4)。其中,经常费的一半由图书馆自主使用,另一半按比例分给各系订购国内书刊。国外订购费则不限制各系比例,但各系选书普遍“没有专人负责”<sup>[30]</sup>,导致国外书刊订购缺乏计划。鉴于此,图书馆决定从1955年下半年起按书刊种类规定相应的经费比例,其中期刊占26%,图书占74%(其中总类4%,社会科学19%,科学技术32%,文学艺术15%,补充旧书4%),此外还规定采访原则是“种多册少”<sup>[30]</sup>。这一规定在执行半年后,同样产生了一些问题,即负责采访的职员执行过死,积压新书目录,不发给各系参考,唯恐各系选购过多影响经费比例,从而漏购了一些新书和期刊。1955年11月,向达坚决纠正了这种状况,将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的经费分为“基本图书补充费”和“经常图书购置费”,前者即意在対前一段时间漏购的书刊进行补充<sup>[20]</sup>。总体而言,按书的种类规定相应的经费比例,可以保证馆藏的全面系统,但执行起来容易过死,导致漏购重要书刊。毕竟,无论是各系购书需求还是出版业本身均存在浮动。通过将经费调整为“经常图书购置费”和“基本图书补充费”两大类,可以对前一段时间的做法进行纠偏和调适。总之,经过实际工作中的多次调整,北大图书馆的经费使用制度逐渐趋于合理,保证了馆藏建设的系统全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馆藏建设注重系统性的思想主导下,尽管学校当时并未开设某些专业,北大图书馆仍然对这些专业的书刊保持收藏。例如,北大在院系调整后不再开设教育学专业,但图书馆并未“把旧有的教育书刊当作压库的废物处理掉,也没有停止这类书刊的继续收藏”,以致80年代初北大重建教育学学科时,学者们欣喜地发现图书馆不仅有1949年以前的教育学书刊,1949年以后国内和苏联的教育学资料也相当齐全<sup>[41]</sup>,对重建教育学学科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向达认为,从事研究工作必须了解学科前沿动态,而前沿成果一般最先在学术期刊发表,因此,图书馆必须成套地、完整地收藏学术期刊<sup>[11]</sup>。早在1952年秋季北大刚搬到燕园时,学校各项工作

还未上轨道,向达便向学校紧急请求一笔2210万元(旧币)的临时图书费用于订购1953年度的外文期刊,以免过期便不能订了<sup>[14]</sup>。院系调整后,向达更是通过建制来加强期刊收藏,1955年机构改革时成立了专门负责期刊工作的参考资料部,还规定期刊订购费占总购书经费的26%<sup>[30]</sup>。有了机构和经费的双重保障,北大图书馆持续对国内外重要期刊进行收藏。数十年后,许多学者从中受益。著名学者厉以宁回忆,尽管国内学术界自1952年以来就不关注西方经济学,但“北大图书馆继续订阅西方经济学主要刊物”,这使他在1972年能够顺利完成上级交办的编译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学术资料的任务<sup>[42]</sup>。

第三,向达认为,图书馆应及时跟进国内外最新科研进展,因而要“做好外文图书的进口工作”<sup>[11]</sup>。向达注意到,北大图书馆特别缺乏1937年以后的国外新书<sup>[39]</sup>,这使学者们难以掌握苏联、东欧及西方国家的最新科学成就,为此必须加强与国际书店的合作,补进国外新书<sup>[11]</sup>。自然,这项工作要花不少外汇,北大图书馆为此规定,国外订购费占总图书经费的3/4。此外,北大图书馆还与国外书商取得直接联系,编印《国外书目报导》分送各系参考,甚至利用教授们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请他们代购书籍<sup>[20]</sup>。1956年8月,北大向财政部外事处申请7000元外汇,用于翦伯赞、冯友兰等教授在法国、瑞士开会期间代购图书<sup>[43]</sup>。这一时期,图书馆还接受了苏联的大学及学者们的俄文赠书<sup>[44]</sup>。

第四,作为精通古籍的历史学者,向达推动北大图书馆购入大量古籍善本、房地契、鱼鳞册、家谱等各类珍稀文献,为北大文科建设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早在1949年5月,向达即在馆务会议上说:“局外人总以为善本书可另置不办,善本书虽目前不需要,而仍应以酌量少数编目,排印目录”<sup>[45]</sup>,指出了善本收藏的重要性。自然,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向达主要是依据个人长期治学而形成的独到眼光。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对此评价道:“向先生出国游学前,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很久。对于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既精研有素,更留心于书刊版本。到英伦,天天出入于英国博物馆、图书馆。某些书籍或材料中国没有,或版本不同,洞如观火”<sup>[46]</sup>。及至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向达仍经常进城逛旧书店,与书商保持密切联系,对书市行情了如指掌。一些旧书商访得少见的善本,常请向达鉴别<sup>[47]</sup>。由于长期关注



旧书市场,向达直接促成了北大图书馆 50 年代初期从琉璃厂、隆福寺等处收入一批珍贵敦煌卷子之事。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北大文科研究所不复存在,该所收藏的以“艺风堂”和“柳风堂”藏拓为主体的一批金石拓片调归北大图书馆,成为北大图书馆的珍藏<sup>[15](126)</sup>。大概由于清楚意识到善本书的搜求不易,尽管屡有教师建议图书馆在各系开出证明的情况下可以借出善本<sup>[48]</sup>,向达仍坚决反对。为此,图书馆专门在校刊上登文解释:“本馆收藏的善本书多为孤本,尤其是宋元孤本书保存了一千多年的古籍,如制度不严格,则丢失损毁的机会就多”<sup>[31]</sup>。总之,这一时期的馆藏建设基本兼顾了系统性和专门性,为图书馆及学校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 3.3 成立专门阅览室,营造优良的科研环境

作为学者,向达懂得良好的科研工作环境之于学者的意义。基于此,他决定在图书馆设立善本阅览室和教员阅览室,并允许教师直接入库查书,极大地便利了科学研究工作。

北大图书馆搬到燕园以前,查阅善本书亦在普通阅览室进行,这既不利于善本书的保存,也给读者查阅带来不便,往往需要跑东跑西才能满足需要<sup>[49]</sup>。为使善本书最大程度地为学者所用,1955 年 1 月,图书馆将中西文善本集中存放在民主楼,在此成立善本阅览室,从此,学者在该阅览室即可查到校内的所有善本书。1992 年,亲历其事的宿白谈到,善本阅览室的成立是北大图书馆迁到燕园以来 40 年中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最感到方便的是,可以同时阅读中西文善本。例如过去要核对关百益的《伊阙石刻图表》,需要先在中国阅览室借出关书,然后提出要求经过同意,才能拿书到西文阅览室再借沙畹、喜龙仁等人的图录,现在在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上就解决了问题”<sup>[49]</sup>。

此外,鉴于图书馆阅览座位紧张,1955 年上半年,向达决定在第三阅览室内设立教员阅览室,专供教师使用。该阅览室共有 80 个座位,附设辅助书库,教师可在此研究、备课、查找资料,节省了去大图书馆排队借书的时间。教员阅览室让那代青年教师受益良多,他们也确实是“来的较多”<sup>[30]</sup>的群体。一个原因或许是当年的住宿和工作条件欠佳,有了教员阅览室,青年教师们才有了安心科研的场所。当时的青年教师朱天俊在 90 年代初回忆:“今天北大文科的一些 60 岁左右的教员,那时都是这个阅览室

的常客”<sup>[50]</sup>。厉以宁也回忆道,教员阅览室是他“每天早入晚出的工作场所”<sup>[42]</sup>。

此外,为满足教师遨游书海的愿望,向达任馆长期间,允许教师直接入库查书<sup>[20]</sup>。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多年后感慨道:向达“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懂得读书人想亲近书的心情,所以允许教师入库”,“入库省了我很多精力和时间。有些书本来只要查阅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麻烦管理员为我们取出来……更重要的是入库可以激发做学问的兴趣,在无意的浏览中还可以发现新的有意义的研究课题”<sup>[51]</sup>。

## 4 结语

有论者认为,向达的史学成就与他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历密不可分,是“图书馆工作造就的一流人才”<sup>[3]</sup>。在多所海内外一流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使向达得以畅游书海,经眼了大量一手文献资料,取得了耀眼的学术成就。就此而言,向达的史学研究确实起于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向达回归图书馆,运用他长期治学积累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影响力,努力建设研究型的北大图书馆。从本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可知,向达任职北大图书馆,“不是虚衔挂名,而是亲力亲为”<sup>[52]</sup>,是身体力行着“学者办馆”。他明确大学图书馆的性质是服务于教学科研的学术性机构,而非行政机构,图书馆直接对学校负责;率领北大图书馆从城内迁到燕园;在院系调整的关键时刻维护了北大图书馆作为综合性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完整性,并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完成深度融合;克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诸多困难,配合全校教学改善读者服务;建立稳定可靠的图书经费机制和长远发展的馆藏体系,为北大作为综合性大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文献基础。凡此种种,体现了作为学者的向达对建设研究型的北大图书馆的不懈追求和长远考量。或许由于担任馆长一职倾注了太多精力,1949 年秋,向达对前来看望他的何兆武说:八个月以来,我没有过一整天是坐在书桌前面度过的<sup>[53]</sup>。向达的一生交错于史学与图书馆学两个不同领域,他的史学思想与成就对后继学者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他在北大图书馆“学者办馆”的实践经历,同样是北大图书馆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图书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页。



## 参考文献

- 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沙知.向达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王树仁.图书馆工作造就的一流人才——浅析向达教授的治学道路[J].图书馆,1987(3):35-36.
- 刘华.向达的图书馆治学之路[J].兰台世界,2013(13):123-124.
- 吴忠良.向达与图书馆[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7):78-82.
- 北大图书馆聘任职员学生助理及向达任代理馆长的信函[A].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49010.
-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等.北京大学纪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邹新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文郁写给胡适的两封信——史料、纪念与感想[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2):109.
-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954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情况及有关改进制度、提高效率的“说明”[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54004.
-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41.
- 向达.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充分的图书资料[N].人民日报,1956-05-11(3).
- 高尔柏.记“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专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0-15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专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28-130.
- 北京大学图书馆向校长进行的工作情况书面报告及馆务会议记录[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52002.
- 吴晞.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杨汝倩.图书馆积压了多少家具[N].北京大学校刊,1955-03-03(3).
-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954年馆务会议、各股讨论汇报、碰头会记录[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54006.
- 王学珍.北京大学志:全四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目前在房子、水、电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N].北京大学校刊,1956-11-07(5).
- 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小结、向校长汇报图书馆情况及1953年以后图书馆经费表、1952年以来购入书刊情况[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56002.
- 图书馆事业存在着危机[N].光明日报,1957-05-25(3).
- 何多源.整理积存图书的经验[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专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65.
- 向达.如何展开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N].人民日报,1954-03-21(3).
- 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馆简单介绍[N].北京大学校刊,1953-10-16(2).
-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现状与未来[N].北京大学校刊,1953-12-01(2).
- 教务处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学生学习上存在的问题[N].北京大学校刊,1956-10-06(2).
-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关于1953及1954年工作计划报告、工作总结大会及馆务会记录[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53007.
- 谢石言.借书难[N].北京大学校刊,1956-09-15(4).
- 本校行政机构及人员调整草案[J].北大周刊,1949-08-01.
-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汇报及1955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55002.
- 北京大学图书馆.最近图书馆工作上的改进[N].北京大学校刊,1956-10-20(7).
- 忙碌在书库里的人们[N].北京大学校刊,1957-01-07(5).
- 丘林.北大及交大京院同学普遍重视正课学习自动规定生活学习制度[N].光明日报,1950-03-29(4).
- 何善祥.怎样利用图书馆的目录[N].北京大学校刊,1957-03-11(4).
- 北京大学9月份经费分配表[J].北大周刊,1949-09-25:47.
-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对于新预算草案的意见及1953年度经费预算书与实支数[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53001.
- 高汶.图书馆工作者担当起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这一光荣职责[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专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42.
- 近山.图书的厄运[N].北京大学校刊,1955-12-17(2).
- 向达.论高等学校图书馆与科学研究工作[N].光明日报,1956-12-13(2).
-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情况及图书馆的任务与职掌[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55001.
- 汪永铨.一副优良的“起跑器”[M]//庄守经,赵学文.文明的沃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59-160.
- 厉以宁.难忘的岁月[M]//庄守经,赵学文.文明的沃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73-174.
- 冯友兰、翦伯赞、周一良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帮助学校购书而申请外汇及冯友兰、周一良购书账单[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57024.
- 珍贵的文献,深厚的友谊[N].北京大学校刊,1956-11-07(1).
-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务会议记录[A].北京大学档案馆:0991949011.
- 郑天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M]//沙知.向达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21.
- 蔡美彪.缅怀向达先生[M]//沙知.向达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81.
- 傅璇琮.对图书借阅和保管的意见[N].北京大学校刊,1956-09-15(4).
- 宿白.我和北大图书馆[M]//庄守经,赵学文.文明的沃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11.
- 朱天俊.回顾与希望[M]//庄守经,赵学文.文明的沃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80.
- 袁行霈.书趣[M]//庄守经,赵学文.文明的沃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0.
- 朱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现状与展望[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6):7.
- 何兆武.缅怀向达先生[M]//沙知.向达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5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100009

收稿日期:2023年9月9日

修回日期:2023年12月18日

(责任编辑:支娟)

(转第125页)





及思想史研究缺乏的不足。该书体例完备、观点鲜明,是一部学术性兼具工具性的专著,推动着目录学史研究创新发展,对于后学具有启示和激励意义。同时该书对目录学史的呈现也创新性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历程,再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知识财富,响应了国家关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对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将有所助益。

### 参考文献

- 1 柯平.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图书馆建设,2023(1):7-15.
- 2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18.

- 3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成都:巴蜀书社,1991:77.
- 4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1.
- 5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1:57.
- 6 王锦贵.数典勿忘祖,“显学”隐巨擘——为司马迁目录学成就正名[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2):4-12.
- 7 柯平.中国目录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8 赵雪芹,于文静,杨一凡.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文本分析与对策研究[J].晋图学刊,2023(1):1-13.

作者单位:张文亮,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刘培旺,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300071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18日

修回日期:2024年1月5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

## A Powerful Work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History

—Evaluation of Professor Ke Ping's *Histo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Zhang Wenliang Liu Peiwang

**Abstract:** In 2022, Professor Ke Ping's *Histo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was published, which cover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bibliography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 discovering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cientific analysis, made up for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history since the 1930s, strengthened the academic status of the field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history and became a new benchmark for bibliography histor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e book can also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such a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dynas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On the whole, the book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cholars to review the history, explore the future and consolid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nd has practical value for inherit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Keywords:** Chinese Bibliography;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Traditional Culture; Book Review

(接第 120 页)

## Xiang Da and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Liu Jie

**Abstract:** Xiang Da is a famous historian and the first director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his career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Xiang Da made it clear that university library is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promo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being responsible to the university. He promoted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s relocation and its deep integration with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improved reader service by overcoming the shortage of library space and staff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teaching of the university. He made attempts to build research-oriented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ree aspects: the funding, the book collection, and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With his academic-oriented vision of library management, Xiang Da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Keywords:** Xiang Da;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djustment of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2024年第一期

大学图书馆学报